

区域一体化推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 四维度分析^{〔*〕}

程必定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共同富裕是在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实现的,区域一体化可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中国这样国土辽阔、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通过区域一体化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就更有必要。借鉴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研判,结合中国国情,可发现区域一体化能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缩小居民收入区域差距,从而为推进共同富裕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在这四个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共同富裕;共同发展;智能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5.001

区域一体化可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在区域间、城乡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在新时代,智能化因素正广泛导入区域一体化,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我国学术界从推进共同富裕视角对区域一体化作系统研究的尚不多见,本文对此初作探讨。

一、区域一体化四维度审视的提出及 智能化因素的导入

共同富裕虽然是人们的普遍愿望,但当今世

界严峻的现实是,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却普遍存在。由世界银行编撰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分析了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今世界收入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也不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他工作的地方。”^{〔1〕}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上述的这份发展报告提出,途径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因为从三个维度审视发现,区域一体化可以缩小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一是提高密度的维度,即加快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努力提高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总

作者简介:程必定,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安徽的机遇与优势研究”(AHSKZD2019D01)和“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研究”(AHSKZD2018D05)的后续研究成果。

量,使当地的居民获得更多收入;二是缩短距离的维度,即通过降低劳务、资本、商品、服务、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流动的难度而缩短距离,特别是允许贫困地区人们向富裕地区迁移,缩短他们和能获得提高收入机会的地方的距离;三是减少分割的维度,即政府要全面考虑相关制度、配套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的目标对象等因素,减少地区间的经济分割,使各地区获得共同发展的机会。^[2]这种三维度审视,对我国研究区域一体化也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那就是忽视从社会发展维度分析区域一体化对缩小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作用,更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分析。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看,应在社会发展维度以“公平均等”程度,作为反映区域一体化发挥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的重要标志。^[3]这样,应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审视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为缩小居民收入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

在新时代还应该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产生的智能化因素,正全面、持续、深层次地渗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既会更好地为一体化地区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也会为推进居民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智能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已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量子通信、航天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移动支付等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智能

化因素正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也为区域一体化提供广泛的智能化支撑,上述四个维度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为区域一体化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二、从提高密度维度分析及智能化因素的导入

提高密度,即提高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密度。发展区域一体化可以提高地区经济密度,增加一体化地区的经济总量,从源头上为缩小居民收入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经济密度与就业及人口密度相关,反映出劳动力和资本趋向地理集中,会加快城市化进程。一般认为,人口集中有助于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保障服务的供应,会造成城乡间收入和基本福利的差距,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通过对发达程度不同的50多个国家的统计发现,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城乡趋同现象应运而生,于是得出结论:在提高密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农村—城市趋同和城市间趋同,城乡社会福利不平等由扩大趋向缩小。并作出展望:一是城市化的规模会更大,二是城乡居民在个人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会获得双赢。^[4]我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比如,在2015—2022年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由56.5%上升到65.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73下降到2.45,7年间城镇化率提高8.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差距缩小了10.26%(见表1),说明随着城市化发展,城乡间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差距缩小了,区域一体化从提高密度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在区域间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条件。

表1 中国2015—2022年城镇化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演变

年度	2015	2022	7年变化
城镇化率(%)	56.5	65.2	提高8.7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1194.8	49283	年均递增6.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421.7	20133	年均递增8.4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73	2.45	缩小10.2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在新时代还应看到,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智能化因素对提高密度会产生革命性影响,主要是增加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提高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我国各地区应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增加经济密度的技术含量,从提高密度维度看,会从以下方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一)为工业化赋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一体化地区提高经济密度的产业基础会越来越强

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即使是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地区,也不能“去工业化”,更不能简单地“再工业化”,而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升工业化”。智能化因素可以为工业化赋能,特别是为产业基础赋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基础主要包括“四基”,即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关键基础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决定着产业发展的基础能力,是影响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反映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韧性和经济实力的基本标志。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达程度的差距,在根本上是产业基础的差距,无论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区域一体化导入智能化因素,会加快推进其产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跨界发展、高端发展,而以“升工业化”为目标推进产业基础迈向高级化,可以提高地区经济密度。这样,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为工业化赋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一体化地区提高经济密度的产业基础会越来越强,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二)促进智能产业率先发展,对一体化地区提高经济密度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智能产业是指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新兴产业,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智能产业会率先发展,在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会逐步提高,而智能产业是高经济密度的产业,在智能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下,会不断提高地区经济密度。我国智能产

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智能化因素对这些地区提高经济密度的作用很大,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智能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提高经济密度的重要限制因素。智能产业发展与大数据的开发运用直接相关,针对东西部地区智能产业差距扩大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于2021年联合发文,在东西部地区一体化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主要是发挥东部地区算力优势和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在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西部地区的成渝、内蒙古、宁夏、甘肃、贵州等8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在西部地区发展数据中心,把东部地区经济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放到西部地区计算处理,简称“东数西算”工程。^[5]可以预见,“东数西算”工程通过算力设施由东向西布局,会促进东西部地区的数据流通、价值传递、产业转移,为西部地区在区域一体化中发展智能产业带来大量机会,从而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密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会为推进东西部地区居民共同富裕而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三)全面推进产业提能升级,一体化地区提高经济密度的产业会越来越多

智能化因素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因素,并不断地向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传递和渗透,既会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又会推进三次产业的跨界发展、融合发展,释放产业发展潜力。显然,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全面推进三次产业的提能升级,使每个产业都能释放增加经济密度的潜力,提高地区经济密度。企业是地区产业提能升级的推进主体,也是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主体,在产业提能升级方面,智能化因素是通过企业导入区域一体化的,而企业对智能化因素的吸纳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信息化程度。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后,我国加快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强调企业提高信息化水平,在企业层面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工信

部还制定了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规范,引导企业达标。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全国2万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企业的调查统计,到2021年12月底,这些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周期缩短17.4%,平均运营成本降低10%,经营利润提高11.2%。^[6]这些数据说明,企业因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普遍增强。这些企业参与区域一体化,必然会促进地区产业提能升级,提高地区经济密度。显然,通过企业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提高经济密度的产业会越来越多,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四)推进都市圈发展和乡村振兴,在整体上提高都市圈的经济密度

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地域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在我国,随着城市化和快速交通的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已进入以都市圈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与城市群相比,都市圈的空间尺度虽然较小,但分布相对均衡、布局较为紧凑,除4个直辖市以外,其他各省、自治区都已形成数量不等、发达程度不同的都市圈。将智能化因素导入都市圈一体化、同城化发展,会从两方面提高经济密度:一方面,吸引人口向都市圈集聚,有利于提高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密度。因为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都市圈的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域的经济高地,有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丰富的智能化因素,就业机会较多会吸引劳动力向都市圈集聚,从而提高中心城市经济密度;智能化因素相对丰富会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从而能提高中心城市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经济密度的提高会增强对都市圈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从而促进乡村振兴,提升都市圈乡村地区的经济密度;中心城市的智能化因素也会向都市圈乡村地区传递,从而推进乡村地区有技术含量产业的发展,提高乡村地区经济密度。这样,将智能化因素导

入都市圈,不仅会推进一体化向同城化发展,更会提升都市圈的同城化功能,在整体上提高都市圈的经济密度,加快缩小都市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从提高经济密度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城乡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三、从缩短距离维度分析及智能化因素的导入

距离是资本、劳务、商品、服务、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也是市场准入的含义,因而是经济距离的概念,反映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距离由空间概念转化为经济概念,是以时间替代空间实现的,所谓缩短距离,不仅是缩短空间距离,还包括缩短时间距离。而作为地理概念的距离是不可缩短的,但时间概念的距离是可以缩短的,那就是运用交通手段,以缩短时间替代缩短地理距离。人类已广泛运用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缩短距离,特别是高速化的交通网及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组合、联运、换乘而形成的立体综合交通网,造就出大交通格局,进一步缩短距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又不断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人流、物流、信息流更为便捷,区域一体化的空间范围得以拓展,从缩短距离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条件。

智能化因素对缩短距离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蓬勃发展的泛在性互联网已摆脱地面上的物理阻碍,在地理空间基础上又形成以互联网为支撑的信息空间,使资本、劳务、商品、服务、信息、数据和观念等在“云”上穿越空间更容易、更快捷,从而革命性地缩短距离。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从缩短距离维度看,会从以下四个方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一)推进智慧交通全覆盖,通过智慧交通高效、安全、全域缩短距离

智慧交通是在交通领域运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汇集

交通信息,对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等交通全领域以及交通管理全过程给予智慧管控支撑,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为公众安全通畅出行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颁发了《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国开始导入智能化因素发展智慧交通。^[7]几年来,通过先进的感知监测系统和大数据平台打造智能化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智慧交通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都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期间,各地区都普遍重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推进智慧交通覆盖全国,高效、安全、全域缩短距离。所谓高效缩短距离,是因为智慧交通会准确运用快速汇集后的海量交通信息,对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等交通领域给予全方位、全过程的智慧管控支撑,会大幅度提高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和不同层次交通枢纽的管理水平及运行效率,从而为区域一体化高效缩短距离。所谓安全缩短距离,是因为当今交通事故已成为人类“第一杀手”,智慧交通运用高新技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所具备的感知、互联、分析、预测、控制等能力,全面分析交通事故的成因、演变规律,设计事故管理策略,可以充分保障交通安全,从而在安全基础上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所谓全域缩短距离,是因为空间通达性是交通的基本追求,通达空间越大,交通的经济社会效益越好,在我国,铁路、公路、航空和内河航运等综合交通网已由线到面拓展,多种交通运输方式构成的大交通趋向全覆盖,智慧交通将智能化因素导入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会大幅度提升空间通达性,从而在大交通全覆盖基础上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显然,智慧交通高效、安全、全域缩短距离,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二)推进新基建发展,为缩短距离培育新动能
新基建是区别于公路、铁路、航道、航空港等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推进新基建发展,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培育新动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基建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因为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武装信息基础设施的步伐,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都会极大地完善海量信息的有效利用,在信息高效利用方面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而培育新动能。二是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的有机融合。因为新基建的重要特征是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成与新基建有机融合的基础设施,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推进这种有机融合,既会发挥新基建的高效引领作用,又会强化传统基础设施的作用功能,在发挥融合优势方面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而培育新动能。三是新基建的创新发展。因为新基建是新课题,在关键技术和应用方面还有很多“瓶颈”,需要研发攻关,如5G基站的昂贵成本、数据中心的高耗电、充电桩的使用效率与安全问题等,需要持续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市场培育而加以突破,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推动新基建的创新发展,攻克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为区域一体化缩短距离培育新动能。显然,新动能会加快新基建发展,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三)企业会成为“数据体”,通过开拓“云”市场缩短距离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产生的智能化浪潮,正在形成人机互动、万物互联的泛在性通达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数字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云计算在信息网络上快速地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形成了“云”上的数字存储。据国际文献资料中心(IDC)的统计,2020年全球数字信息有30%存储

在“云”中,而且还会快速提升,在“云”上缩短距离成为大趋势。对企业来说,云计算是重要的管理工具,将智能化因素导入企业管理,企业会成为“数据体”,通过开拓“云”市场缩短距离。一方面,就单个企业而言,经营管理者利用大数据在“云”上进行决策、生产、销售、经营、为客户服务,缩短甚至消除企业与上下游关联企业及消费者的距离,大幅度提升企业运行的敏捷程度,显著降低企业运营的经济成本和制度成本,扩展生产与服务网络空间,提升企业的规模效益和在细分市场的占有率;另一方面,就产业发展而言,由于越来越多的关联企业上“云”,可在网络平台基础上打造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在整体上推进产业链向智能化生态群转变,缩短乃至消除产业协同发展的地理距离。重要的是,产业有了智能化的生态群,单个企业可以在分工合作、协同发展中分享发展红利,就有不竭的参与动力,企业会持续导入智能化因素在“云”上进行经营管理,缩短距离就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显然,将智能化因素更多地导入企业管理,在线上形成规模巨大的“云”市场,通过“云”市场缩短甚至消除区域一体化的地面距离,会从企业层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四) 推进都市圈同城化,通过同城化缩短距离

世界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都市圈的发展会经历一体化、同城化、国际化三个阶段,中国的都市圈当前大多进入同城化阶段,所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方向是同城化。^[8]智能化因素的导入,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都市圈的同城化,而同城化更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缩短距离。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显著特征是中心—腹地的同城化,反映在人口流动方面,腹地的乡村人口在向中心城市转移的同时,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由于智能化因素由都市圈的中心区向城郊区扩展,城郊地区不仅拥有与中心区同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且还拥有中心区不具备的生态环境优势,形成“城乡同值”的

“田园都市”,那些有条件的城区居民会在城郊购租房居住,人口流动会出现“城郊化”的变化。二是由于都市圈同城化程度的提高,形成1小时甚至半小时通勤圈,人口在城镇间的流动更便捷,住在A城的人可以到B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会出现部分人口由职居同地向职居分离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加适应智能化时代技术进步快、就业岗位选择性大、工作方式更灵活的新特征,会兴起弹性就职、柔性化的工作方式,更利于人们各显其才、各尽其用,增加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利于汇集个体的力量,提升都市圈同城化的发展水平,在观念、心理、文化上缩短距离。显然,将智能化因素导入都市圈的同城化,会从缩短距离维度为推进都市圈的共同富裕而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四、从减少分割维度分析及智能化因素的导入

区域一体化要求的减少分割,是减少对市场的分割,反映国家或地方政府选择的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对行政区界的可穿透程度。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多层次的行政区,行政区界不是问题,问题是行政区界的不当管理而对要素流动造成的障碍。区域一体化是跨行政区的,我国地方政府是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但仍存在行政区的障碍,对区域一体化的深度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分割。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地区通过开展区域合作来破解行政区障碍,以构建区域合作机制、制定区域一体化规划、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等等减少分割的举措,推动了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的跨行政区流动,让区域一体化在许多地区得到持续发展,从减少分割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条件。

区域一体化是动态发展、不断深进的,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往往又会产生新的分割问题。应该看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下,智能化因素会以更深层次、更多领域、更有效的方式减少现有的分割

和将出现的分割。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从减少分割维度看,会从四个方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一)形成广覆盖的“万物互联”,会革命性地减少分割

区域一体化的分割,不仅和地理、文化、政治体制机制及政策因素等有关,从生产力角度看,还有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方法工具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因为科技落后,加上多种因素的重叠,即使人们认识到分割是不合理的,但也无可奈何。对此,学者史蒂夫·萨马蒂诺(Steve Sammartino)称之为“碎片化时代”。^[9]互联网、物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都是运用科学技术使无数个碎片按人类的需求而合理连接起来,减少了人和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受分割的困境,极大地解放、发展生产力。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会形成广覆盖的“万物互联”而革命性地减少分割。“十三五”以来,我国强调发展“互联网+”,一个显著特征是突出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带动下,物联网应对不同层次的需求而加快应用普及,如农田水利、医疗卫生、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数以万亿计的新设备接入网络,物联网在更多领域减少对一体化分割的效应日益凸显。随着新基建的发展,物联网又向“物联网”战略升级,智能化因素会更广泛、更深入地融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广覆盖、有活力的“万物互联”,智能化力量更会革命性地减少对一体化的分割,并通过减少分割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会多领域、全方位地减少分割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开启的智能化革命,主要特征体现在对数据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方面,数据已经成为最活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建人克劳斯·施瓦

布教授所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让人类变得更数字化”。^[10]我国也高度重视数据的作用,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数据管理部门(党的二十大后又成立了国家数据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将数据的作用推广到经济社会各领域;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4月颁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据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新应用。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又联合出台《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对加快数字乡村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推进数字化力量渗透到我国乡村。^[11]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力量。与以往强调跨地域物理空间的区域一体化不同,借助数字化力量的区域一体化,会在减少分割方面走出一条新路。显然,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充分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新作用,会多领域、全方位地减少对区域一体化的分割,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三)推进区域合作的数字化升级,会高效率、更深层地减少分割

我国各地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特别重视构建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的途径很多,智能化因素的导入是最有效的完善途径。其趋势是,区域合作会向数字化升级,高效率、更深层地减少对区域一体化的分割。政府和企业是区域合作的两大主体。从政府层面看,智能化因素导入数字政府建设,形成“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化治理模

式,推进区域合作向数字化升级,再造政务流程,为政府组织区域合作向数字化升级提供了理念、方法、工具,大量的区域合作事务也会通过人机互动的智能化方法决策、实施,推进区域合作机制趋向完善,所发挥的作用,既会使区域合作趋向高效,又会使区域合作趋向精准,以高效而精准的区域合作减少对一体化的分割,从而减少来自政府官员的主观决策、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不断减少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所产生的阻力和分割。从企业层面看,智能化因素导入企业管理,会推进企业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以管理数字化的高效性、精准性参与区域合作,减少区域一体化中可能出现的政企分割、企业之间的分割。因为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驱动力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因素导入企业管理,会增强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驱动力和应对市场变化的敏捷性,更有效地对接政企合作的数字化升级和行业联盟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管理提升企业参与区域合作的能力,更好地发挥企业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推进政府和企业区域合作的数字化升级,高效率、更深层地减少分割,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四)区域合作成果会加快由当事方的互享向社会共享延伸,在共享方面更好地减少分割

区域之间的合作同企业之间的合作一样,都是出于各自发展需求,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通过协议或合约共同实施的,合作成果只由当事方互享,具有排他性;而区域合作与企业合作不同的是,前者的成果具有外溢性,不仅由合作当事方互享,而且还向社会延伸,形成区域共享。这样,在共享方面减少对一体化的分割。比如,两个相邻的县市合作共建一条跨界公路,不仅会方便需要通过这条公路的所有人的出行,直接效益向社会延伸,而且因为这条公路还带动了沿线地带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更多的间接效益也向社会延伸。又如,区域间的产业合作会向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延伸,区域间的技术合作会向教育文化领域延伸,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会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区域间的工商管理合作会向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延伸,等等。区域间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说明,因为区域共享的资源配置效果最佳,社会福利最大,所以,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放大社会福利,加快区域合作成果由当事方的互享向社会共享延伸,在发展成果的共享方面更好地减少对一体化的分割,也就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五、从公平均等维度分析及智能化因素的导入

公平均等是从社会维度对区域一体化发展成效的审视,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福祉的共同增长,以相互认同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促进公平均等。世界银行2009年发展报告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三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审视,虽然也是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地区居民对财富的分享和所享社会福利的增长,但都是通过移民和流动实现的,却忽视了非移民、非流动居民对财富的分享和所享社会福利的增长,这对其他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分析是合适的,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无论是流动的居民还是非流动的居民,都应共同分享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红利和增长的社会福利而实现共同富裕,公平均等就是我国审视区域一体化发展成效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而区域一体化会从公平均等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

从许多地区多年来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成效看,已在四个方面提升了公平均等的程度:一是就业机会趋向公平均等,二是公共服务趋向便利共享,三是市场秩序趋向公正有序,四是生态保护趋向生态补偿。还要进一步看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下,因为智能化会造就万物互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时代,人人既会贡献信息,又会分享信息,在信息分享中获得机会均等和发展成果的普惠,普惠共享的先进价值

理念会广泛深入人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将保障实现持续的公平均等。从公平均等维度看,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以上四个方面都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向,每个新趋向都会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一)就业机会公平均等会趋向创新创业机会公平均等

世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通过对全球 46 个国家和 800 多个职业的分析,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将有 4 亿—8 亿人的工作岗位可能被自动化的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当今全球劳动力的 1/5,而同时,全球将有 0.75 亿—3.75 亿人可能会因自动化寻找新的工作。^[12] 这个报告反映了智能化推进自动化会造成新的就业形势——有的就业岗位会消失,有的就业岗位通过创新产生,就业总量在新的形势下大体能保持供需平衡。在我国,智能化因素已越来越多地导入区域一体化,就业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显著特征是:一方面,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自动化将会大面积替代机械化,“人当作机器”的时代会进入“机器当作人”的时代,机器人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人类的工作,一些职业岗位将会消失;另一方面,智能化会推进创新创业,又有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将会产生,不仅就业机会趋向公平均等,而且,创新创业机会也趋向公平均等,激发大众创新创业,在新的形势下实现更高层次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形势下,就劳动者个人而言,技能成为获得就业机会的决定性条件;就各级政府而言,应该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就业总量能大体保持供需平衡。这样,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在就业方面带来的公平均等,已不仅仅是就业机会的公平均等,更重要的是创新创业机会公平均等,会从创新创业层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二)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会趋向扩面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一体化地区的人民群众对跨行政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

增长,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地方政府通过协调合作,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体化地区的公共服务趋向便利共享。智能化因素的导入,让公共服务在便利共享的基础上,又会趋向扩面升级。在扩面方面,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地方政府会普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跨地区的“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方面,包括开展跨地区的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协助认证、跨省(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工伤及失业保险的区域合作、住房公积金异地提取和银行贷款的异地认证等,公共服务的地域范围和服务领域都逐渐扩大。在升级方面,主要是为满足一体化地区城乡居民对便利共享公共服务越来越多的需求,地方政府进一步引入智能化因素,既运用更多更先进的智能化技术,为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程度提供越来越好的技术支撑,又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领域,提升公共服务标准,完善公共服务的机制,改进公共服务的方法,使公共服务更加公平均等、便利共享。这样,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推进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扩面升级,会从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层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三)市场秩序公正有序会趋向便捷透明

我国长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地区,都特别重视市场一体化建设,构建公正有序的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比如,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该地区的省、市还从地方立法、行政执法和保护消费者及企业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推进形成公正有序的市场秩序,为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13] 随着智能化因素导入,市场秩序不仅公正有序,而且会便捷透明,使市场一体化更有效率。可以说,对成熟的区域一体化市场而言,公正有序是必要条件,便捷透明是充分条件,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智能化,恰恰具有便捷透明的基本功能,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

化,会为一体化市场趋向成熟提供充分条件,市场秩序会趋向便捷透明。比如,在市场主体进入审批阶段,市场监管部门导入智能化因素,利用全程电子化平台全时开放企业登记,可实行“零见面”无人审批,减少人为因素的误判,保障审批的透明性;又比如,在市场主体营运的监管阶段,市场监管部门导入智能化因素,在市场监管中拓展物联网、大数据的应用与融合,可对市场主体的营运活动进行“智能监管”,使市场主体及时处理和解决出现的各类问题,大幅提高市场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做到便捷而透明。还比如,在服务市场主体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导入智能化因素,可高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市场监管进行大数据分析,科学评价消费者对消费环境及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形成“市场监管云”的智能服务,及时了解市场秩序的变化情况,便捷而透明地服务市场主体和消费者。这样,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推进市场秩序由公正有序趋向便捷透明,会从市场一体化建设层面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四)生态保护会趋向生态补偿的公平均等

生态补偿是生态保护的最有效手段,我国长期推行区域一体化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跨省区流域的生态补偿试点,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跨省区的生态补偿类型和途径却较少,机制也不完善。实际上,跨省区生态保护的类型很多,不仅有流域,还有山林、草原、湿地、大气等,不能只局限在个别面积不大的流域试点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途径也有多样,主要有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种途径,而我国目前实施的仅是政府补偿途径;不同的生态补偿途径会有不同的机制,涉及责任主体、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额度、补偿期限等,这些补偿途径都尚在探索之中。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科学的理论解释和可行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很难说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做到公平均等。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从两大方面有助于解决这些难题:一方面,在

对某些流域试点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导入智能化因素,推进试点向全流域扩展和升级,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全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进行采集、分析、研判,会科学而合理地解决政府和市场两种补偿途径如何在跨省区流域实施的问题,并在实施中检验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跨省区生态补偿成熟模式,在更广地区实现生态补偿的公平均等。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地区可导入智能化因素,在山林、湿地、大气等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会在更多领域逐渐实现生态补偿的公平均等。这样,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从促进生态补偿公平均等维度,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六、结 语

区域一体化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为缩小居民收入区域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而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会对这四个维度赋能,那么,这就应该走智能化道路,从源头上培育和输送智能化因素,为区域一体化推动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多更好条件。

所谓走智能化道路,是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以智能化因素为区域一体化赋能,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机制、动力和效率发生深刻变革,更有效地实现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促进公平均等的目的,多方面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在我国区域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走智能化道路具有时代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14]

从历史视角看,走智能化道路具有时代必然性。因为智能化是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曾经历了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形成

了生产力发展的几次伟大浪潮,为人类社会进步输入了巨大的动力,21世纪初人类掌握了更为复杂的智能技术,正在掀起波澜壮阔的智能化浪潮。可以说,智能化是人类社会在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走智能化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时代必然性。

从世界视角看,走智能化道路具有时代必要性。因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新背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今世界秩序演变不可避免的现象,出现的“乱局”虽然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但本质上是世界秩序的深刻变革,推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社会化深入发展,世界正向进步方向演变。而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世界向进步方向演变的巨大力量,它在世界范围前所未有地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可以说,在这种背景下走智能化道路,是世界形势发展的要求,因而具有时代必要性。

从中国视角看,走智能化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我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是发展中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部面临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带来的挑战,外部面临着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和打

压的严峻挑战,而走智能化道路,深度融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时代要求。在这些条件下走智能化道路,我国是完全可行的。

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促进公平均等的效果都很显著。那么,我国实施区域一体化的地区,都应深度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从各地的发展实际出发走智能化道路,向区域一体化源源输送智能化因素,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条件。这个发现在长三角地区已得到了初步验证。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起步早、水平高的地区之一,智能化因素也很丰富。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市三省都注重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促进公平均等的效果都很显著,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无论是一市三省内部的城乡之间,还是一市三省之间,居民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如在2018—2022年间,长三角一市三省内部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缩小了0.125、0.151、0.139和0.151(见表2),说明长三角一体化确实为推进一市三省内部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而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条件。

表2 长三角四省市2018—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演变

省市	2018年			2022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程度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上海	68033.6	30374.7	2.240	84034	39729	2.115	0.125
江苏	47200.0	20845.1	2.264	60178	28486	2.113	0.151
浙江	55574.3	27302.4	2.036	71268	37565	1.897	0.139
安徽	34393.1	13996.0	2.457	45133	19575	2.306	0.15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202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统计局,<https://tjj.sh.gov.cn/tjgb/20230317/6bb2ef0811ab41eb8ae397c8f8577e00.html>;《2022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统计局,http://tjj.zj.gov.cn/art/2023/3/16/art_1229129205_5080307.html;《202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统计局,http://tj.jiangsu.gov.cn/art/2023/3/3/art_85275_10787011.html;《安徽省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安徽省统计局,<http://tjj.ah.gov.cn/ssah/qwfbjd/tjgb/sjtjgb/147903181.html>。

若以上海为参照考察一市三省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上海的程度,2022 年比 2018 年

分别上升了 3.27、4.33 和 3.76 个百分点(见表 3),说明长三角一体化为推进一市三省间的居民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共同发展的条件。

表 3 苏浙皖 2018—2022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上海程度的变化

省市	2018 年		2022 年		苏浙皖与上海相比的上升程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以上海为 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以上海为 1	
上海	64182.6	1.0000	79610	1.0000	—
江苏	38095.8	0.5936	49862	0.6263	3.27 个百分点
浙江	45839.8	0.7142	60302	0.7575	4.33 个百分点
安徽	23983.6	0.3737	32745	0.4113	3.76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年;《2022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统计局,https://tjj.sh.gov.cn/tjgb/20230317/6bb2cf0811ab41eb8ae397c8f8577e00.html;《2022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统计局,http://tjj.zj.gov.cn/art/2023/3/16/art_1229129205_5080307.html;《2022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统计局,http://tj.jiangsu.gov.cn/art/2023/3/3/art_85275_10787011.html;《安徽省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安徽省统计局,http://tjj.ah.gov.cn/ssah/qwfbjd/tjgb/sjtjgb/147903181.html。

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绩验证,将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以智能化对一体化赋能,会为推进区域间、城乡间居民的共同富裕而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将会带动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也会为各地区通过区域一体化推进共同发展迈向共同富裕提供示范和借鉴。

综上,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国各地区不仅应注重区域一体化为推进共同富裕而在区域间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而且还应使更多的智能化因素导入区域一体化,为区域间、城乡间居民加快迈向共同富裕,创造共同发展的更好条件。

注释:

[1][2][4]世界银行编:《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胡光宇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48、62—72 页。

[3]程必定:《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论》,《学术界》2019 年第 11 期。

[5]《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5/26/5612405/files/37d38a7728564ad8b5e4f08c16cfe8f2.pdf。

[6]《迈进两化融合贯标 2.0 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加速》,今日智造,http://www.todayim.cn/news/show-56691.html。

[7]《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

方案》,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6-08/05/5097842/files/4a6788763ac24835b6972caa4c13c51f.pdf。

[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9]328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https://www.ndrc.gov.cn/xwdt/ztlz/xxczhjs/ghzc/202012/t20201224_1260130.html。

[9][澳]史蒂夫·萨马蒂诺:《碎片化时代——重新定义互联网+商业新常态》,念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 页。

[10][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新型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引言”,第 1 页。

[11]2022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10 部委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围绕发展目标,从八个方面部署了行动计划: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二是智慧农业创新发展行动,三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行动,四是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动,五是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六是智慧绿色乡村打造行动,七是公共服务效能提升行动,八是网络帮扶拓展深化行动。

[12]James Manyika, et al., “Jobs Lost, Jobs Gained: What the Future of Work Will Mean For Jobs, Skills, and Wage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ovember 28, 2017 Report,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jobs-lost-jobs-gained-what-the-future-of-work-will-mean-for-jobs-skills-and-wages.

[13]2018 年 11 月,长三角一市三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继通过了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地方立法文件。

[14]李彦宏:《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 5、130 页;张江健:《智能化浪潮——正在爆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89、269 页。 [责任编辑:刘毅]